

改革试点要为全局性改革趟出路子

□毛同辉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

切实发挥出改革试点提情况、探路子的作用，笔者以为，以下三点尤其需要科学把握：

第一，改革试点须稳步推进，不能浮躁。既然是试点，就意味着是创新，是尝试，就意味着需要边干、边看、边总结，根据试点推进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变化、问题审时度势，来权衡、研判和定夺。因此，试点工作必须祛除浮躁心理，急于求成不行，单纯追求政绩而光做花

样文章、回避矛盾问题不行，立决心切而忽视规律，甚至违背规律更不行。既然是做试点，肯定会面对一些拿不准的问题、棘手难办的矛盾，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而且还须静下心来，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尽可能多接触第一手材料，做到重要情况心中有数。

第二，改革试点须且行且思，及时总结反馈，实践和思考不能脱节。改革试点的目的，是通过小范围的探索为全局性的改革摸索规律，趟出路子，因此，就不能只低头赶路，而不抬头看路。试点工作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认识不断完善丰富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坚持问题导向，

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困难一个一个克服，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做到“蹄疾而步稳”的同时，还需把改革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的认识，推动制度创新。

第三，改革试点还要坚持风险可控原则，既不能遇难即退，浅尝辄止，也不能硬干蛮干，不管不顾。既然是尝试，就难免挫折和失败，尤其是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试错其实也是收获，它以排除的方式让我们更接近目标。但尽管如此，我们在试点推进中还是尽可能要对不利影响、不确定因素估计充分、预判到位。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干部决策时要讲科学，讲规律，讲担当，少一些“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不负责任的主观作风，把论证工作、组织工作、调查工作等各项“功课”做严做细做实。

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我们要聚焦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目标，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勤于总结，把各项改革的试点工作走在前列，干到实处，确保有所改，有所成，为全局性改革趟出路子。

诺奖是对中国大师的奖励

□许锋

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授予屠呦呦与另外两名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科学研究而首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科学家，这一奖项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最高奖项，其意义显得特别重大。

很多年前，钱学森先生曾有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现在，屠呦呦的事迹可以证明，中国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屠呦呦没有留过洋，没有博士学位，不会说英语，与现在时髦的国际化人才的标准不沾边，属于本土土长的“本土”人才。

从屠呦呦的成长轨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钱学森之问”：凡大师者，绝非一时一日一季一年之功可成，绝不能速成，需要时间，是一个用文火慢慢熬的过程，是日子缓缓磨砺的过程，是在岁月静好一般的心态中执着坚守、静静等待的过程，是对诸如做学问者整日抓耳挠腮、坐卧不宁，如热锅上的蚂蚁左顾右盼，荣誉光环从天而降等观点的绝妙讽刺。

屠呦呦不是天才，从她的经历可以看出，她没有任何显赫的背景，她的成长也并非“一帆风顺”：出生于1930年底的她读完初中、高中，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时，年已21岁，大学毕业时年已25岁，担任副研究员时年近50岁，担任研究员时年已55岁。如果按照现在的“速成”标准和人才培养方式，她“成长”的每一步似乎都比“别人”慢半拍或者一拍，甚至好几拍。我们不知其中的缘由，也没必要探求或者追问，那或许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年代、时局有关。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对物质、地位、荣誉，是不在乎的，不斤斤计较的，不唯利是图的，如果做学问的人整日陷于争名夺利的泥潭之中，又如何能静下心来搞研究、做学问？

屠呦呦因获得诺贝尔奖受到世人关注，仿佛一夜之间成为“大师”。但其实，她成为大师已经很多年。我认为，大师或可分为两种（前提是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一种是“官方”的认定，比如获得政府、学术机构、民间颁发而有影响力的奖；一种是人们心目中的认可，你能说曹雪芹不是文学巨匠、大师？你能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不是大师？就算袁隆平先生现在不是院士，他的成就和对人类的贡献，你能说他不是大师？他们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杰出人才。用时髦的话说，屠呦呦获诺奖与不获诺奖，都不影响她的大师“范儿”，是院士或不是院士，也不影响她的大师“范儿”。诺奖，是对中国大师的奖励，而非获奖后才成为大师。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过许许多多杰出、伟大的人物。只是，在芸芸众生之中，杰出者永远是少数，大师永远是凤毛麟角。而且，有些有潜质有可能成为杰出人才、大师的人，在前进的路上又有可能迷失方向。故而，大师往往可遇不可求。

让我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那些能一生坚守、永远耐得住寂寞、愿意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冷板凳的人，静静地等待花开。

互联网深度介入社会生活

□唐华

回望过去这五年，我们发现，人们的生活有了诸多可喜的变化。

其中有一条，是老百姓，特别是广大网友们感触最深的，那就是互联网深度介入人们的生活。

虽然在很多年前，移动互联网就已经诞生了，但真正迎来大发展的时期还是在最近几年。大街上、地铁上、公交车上，随处可见刷朋友圈、微博和看视频、电子书的“低头族”。当然，这个新的行为习惯未必值得称道，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套用一句电影台词：满大街的手机不是安卓系统就是苹果iOS，你要是用个塞班系统的，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浏览资讯、购物、订餐、购票、理财……这些以往都要费些工夫、跑跑腿的活动，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搞定。移动互联网还大幅压缩了时空的距离，让人人都住进了“天涯若比邻”的“地球村”；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无线网络，你就能和亲朋好友随时视频聊天；如果你喜欢分享自己的所思所为，你可以轻松地记录下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并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告诉亲近的人。

再加上物联网的发展，人与物的时空距离也被拉近。你可以随时随地操控家中的照明系统、各种家用电器和私家车；食品溯源渐渐流行起来，购买的“一袋粮”、“一颗菜”，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知道它的“前世今生”。

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让这些过去只停留在想象中的场景一步步“照进现实”，人们的生活正深深打上互联网的烙印，以致于有人戏称，自己没有互联网就活不了。

不过，世间万事万物都逃不开阴阳两极、正反两面。互联网在提升人们幸福指数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

比如，各种基于地理位置信息分享的应用软件，虽然更有效地对接了产品（或服务）和需求，但也让一些不法分子更容易获取用户的私人信息；你可以通过手机APP和家中的摄像头随时查看住所状况，可要是黑客“杀”进来，等于这些情况也24小时对他人“直播”；用手机转账或者买理财很方便吧，但要是系统存在漏洞，别人转走你的钱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阿里巴巴的宝库，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宝物；用不好，它是潘多拉的魔盒，给人自己带来无尽的伤害。而且，随着技术的日臻成熟，这种“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两极效应恐怕会愈发明显。

因而，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在探索如何让互联网变得更快、更强大的同时，也要致力于让它变得更安全。这需要人们打破一城、一地，甚至一国的界限，在最大的范围内谋求共享共治。

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权力才能更有为

□尹亮

假如老张是某个市级机关的正处级干部，那么现在他必定处在如下“约束”中：办公室面积必须在24平方米以下；原先可能有的专车也必须取消；逢年过节若想去亲友家贺个喜，也只能自费购买、自费邮寄；想给子女大肆操办婚嫁典礼，更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此严格的要求，正是“十二五”规划以来的新气象。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回首“十二五”，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便是——领导干部们多了不少约束，有了实打实的“硬杠杠”。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狠刹节假日公款送礼、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的不正之风；从严肃处理“会所中的歪风”，到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停建楼堂馆所；从推行公务卡制度，到改革公务用车制度……这些变化彰显着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越来越严，领导干部们也经历着大的转变，部分人甚至感到“有些不太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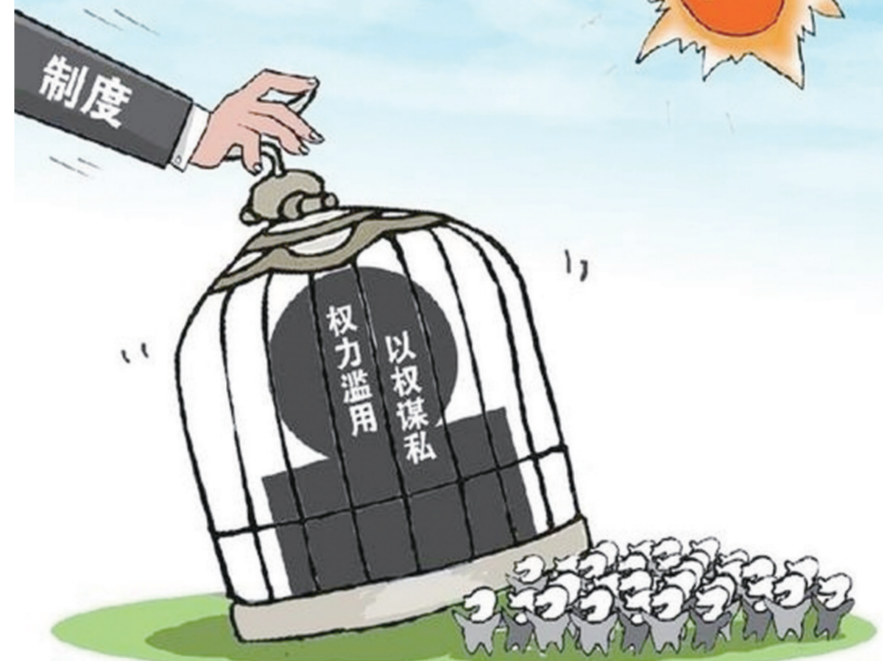
不单如此，整个“十二五”期间还出台了多项法规、条例，来约束、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禁令，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

工作作风进行了严格规范。

过去五年，中央还从其他方面对领导干部进行了规范。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这要求领导干部更加具有法治思维，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领导干部的生态责任有了追究制度。而《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等文件的印发，也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做出了严格而明确的制度性规范。

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权力才能更有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一个强大国家或组织的背后，必定有一群作风优良的领导干部队伍。而如何既充分调动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同时又能对他们的权力有所监管，则是决定发展成败的关键。这些“硬杠杠”、“硬规定”，实际上正是权力的“防腐剂”和“制动器”。

有所敬畏，才能有所作为。领导干部头上的“硬杠杠”根本不是什么“紧箍咒”，而是更好为人民服务的规范和标准。某种意义上，也是领导干部清白为官、干净做事的“护身符”。对于老百姓



来说，领导干部们的“不太自在”，反倒拉近了与民众的心理距离。领导干部的种种不便，在老百姓看来却是特权的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在老百姓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唯有止于至善，方能不断提升。在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党和国家正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重任，这都需要一支能战斗、敢战斗的领导干部队伍冲锋在前。而为了确保这支队伍遵守法律法规，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些“硬杠杠”不仅不可或缺，还必须持之以恒地执行。

“门好进”、“脸好看”理应成为一种常态

□杨朝清



2013年10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两起政府工作人员刁难办事群众的个案，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刻画得淋漓尽致，引发社会关注。这边厢，老百姓上门办事具有“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反复奔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那边厢，相关工作人员却“任

性而为”，既让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也让他们承受精神上的伤害和痛苦。

伴随着权利意识的增强，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评价标准逐渐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转变。“门难进”、“脸难看”说到底还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产物，缺乏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的共同体意识。一件原本并不复杂的事情，却让老百姓有了“瞎折腾”、“伤不起”的艰辛与悲情。每一次“闭门羹”，不仅背离了公共服务便民、利民的基本属性，也在无形中损伤了相关人员的社会形象，加深了公共部门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感和隔阂感。

长江学者、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徐勇教授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制度与人的关系，它通过引导、协商、沟通、参与来达到治理目的，强调多元互动共治”。“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治理理念的转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门难进”、“脸难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的社会效益，更加注重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以一种更加亲和、便利的方式去惠及老百姓，是“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让群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断深入的当下，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尤其是领导干部，为群众“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风尚。

农民办理医保更加便利、快捷也好，民营企业办理证照、手续更加方便也罢，都是“门好进”、“脸好看”的一个缩影。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亲身体会，公共部门的工作作风较以前有了不小的变化，现在到一些机关服务单位办事，大多数工作人员“来有迎声，走有送声”。

可是，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事不办”、“事难办”的现象。如果说“门好进”、“脸好看”考验的是服务态度，“事好办”则关乎服务效能。高效、优质的行政效能既是竞争力，也是生产力，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治理水平。

“不等不拖，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显然离不开公共服务的优化和升级。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的背后，是发展理念的端正、价值排序的更新与人文关怀的重振。只有重新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时代之问，只有进一步发挥制度应有的效力，“事难办”、“事不办”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老百姓才会有更多的幸福感。

公共服务的成色，也能衡量老百姓是否有足够的体面和尊严。一个旨在让劳动者“生活上多一些保障，心灵上多一些温暖”的社会，“门好进”、“脸好看”理应成为一种常态。